

历史人口

先秦的人口统计与管理

· 刘淑英 ·

人口统计与管理是社会管理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兴亡。因此,历代统治阶级、政治和经济学家以及人口学家,都十分重视人口统计与管理,并为之进行认真的研究。同时,提出许多颇有见地的建议和措施。

我国是一个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世界上也是最早进行人口调查和统计的国家之一。早在夏代,统治者已经有过人口统计之举,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问题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而人口数量的多少,直接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特别是具有战斗力和劳动能力的人口规模,对当时的国家、方国和基层组织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往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先秦时期历代统治阶级十分重视人口统计与管理。

一、先秦的人口统计与管理概述

(一)夏商

夏商时期是奴隶社会形成和发展时期。那时的人口构成已有“百姓”和“民”的区分,百姓一般指奴隶主,或称之为“大人”,包括王和与王共同统治人民的大小奴隶主,他们的人数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很小。“民”一般指奴隶,包括从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家务劳动的各种奴隶。还有少量的平民,他们有人身自由,地位比奴隶高一些。究竟夏朝有多少人口?无从考证。西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记载有夏禹时期的人口数字:“及禹平水土,还为九州,……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这个资料不可深信,尽管我国在统计人口方面开展得较早,但是在四千多年前的条件下,详细统计全国人口数量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我国有文字记载,是从商朝开始的,虽然这个数字不可靠,但也能反映出当时人口发展的状况。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也可以看成是皇甫谧以前的学者推测,估计夏朝大约有一千多万人。《竹书纪年》曾记载一段夏朝史实,即“明年后缙生少康,既长为仍牧正,碁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将至仍少康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绪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当时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一成,为十里见方的土地。一旅,是五百人口,指当时士兵的人数。从这段史实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早在夏代已经 人口统计的活动了。

统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了适应人类社会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我国上古时期的“结绳而用之”可以说是最早的统计实例。夏商的奴隶主极为重视人口和土地的统计,这个时

期在甲骨文中，已有不少人口统计的零星记载。如：

“伐二千六百五十六人……”；^①

“己未卜戡王邠三千人呼伐……”；^②

“……百人……用”；^③

“……人三千呼伐……”；^④

以上有关甲骨文的数字资料比较真实可信，但所反映的只是对个别地区或事件的人数统计，对整个殷商时期的人口概况，却不能有总括的了解。有些甲骨文记载：

“贞勿登人三千”；^⑤

“……三十羌罍……牛”；^⑥

“……罍十艮”；^⑦

“……罍祖丁十伐十宰”；^⑧

这些记载表明，殷商统治者曾经进行对于某个地区的人口清查统计工作。“登”指人口统计，“罍”指人口登记的造册。从甲骨文的记载可以看到，殷商统治者在农耕前召集众人进行人口登记造册。在战争前夕进行人口清查统计，当然统计的主要对象则是具有劳动能力或战斗力的人口，老弱病残不在其例。殷商虽然没有总人口统计数字，但其人口统计比夏朝更为广泛，更为具体。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商朝将人口统计扩大到各个领域。有些甲骨文所记的人数，如：

“不其降罍千牛千人”；^⑨

“辛巳卜，争，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一万，乎伐□方”；^⑩

“贞我登人，迄在黍不罍，受有年”。^⑪

这些统计数字，是对各类人员的登记，也有对牲畜和饲养人员的登记造册，还有按地区召集兵员征战。如从妇好这个领地登记三千人，从旅地聚集人员一万人。可见商代统治者对于区域、部落组织的人口清查统计经常进行。“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不仅说明商朝已进入奴隶制社会，而且在社会和人口管理方面有了一定的规章制度及人口统计办法。

(二) 西周

西周是我国奴隶制的鼎盛时期，也是奴隶制开始走向崩溃的时期。西周的人口统计是与其政治制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出于国家管理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西周对人口统计是十分重视的。在青铜彝器铭文中，所记赐人民、臣仆、奴隶之数，除以“人”、“夫”计算外，也有以“家”来计算的，只可惜同样也是零星的数字，不能推算出西周的人口总数。西周初，公元前十一世纪武王伐商“於是武王徧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以东伐纣。”^⑫公开的人口调查和统计，在西周时期也已经出现。“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命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人，廩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审之以事，王治农于籍，蒐于农隙，禘获亦于籍。狝于既烝，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又何料焉！不谓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恶事也。临政示少，诸侯避之。

①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

⑪ 《英国所藏甲骨集》。

⑫ 《史记》卷四，《周本纪》。

治民恶事，无以赋令，且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王卒料之。”^⑬ 当时宣王料民的目的在于补充兵员，以保卫王室，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

在“料民”一事，仲山父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然而在王室受了重创，实力锐减，人口稀少的情况下，如“不谓其少而大料之”，无异是公开示人以弱，致使“诸侯避之”，不亲附王室。但他并不反对奴隶主统治者应该掌握国家的人口数字，而是认为上古时代，通过设置的司命、司徒、司寇、牧人、百工、场人等已经掌握了人口的“少多死生出入往来”，根本无需再进行独立的人口调查。仲山父的言论从侧面也反映出，西周初期，奴隶主阶级对国家各类人口的统计数字是十分重视的。从《周礼》的有关记载中亦可得到印证。《周礼·秋官》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命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司民每年要把国都与郊野的“生齿以上”者，注明性别登记在人口册上，生者登，死者削，实为专司人口统计的专职官员。而且，人口数字上报周王时，“王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如此慎重其事，西周统治者对人口数字的重视不难想见。这段记载表明，我国悠久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户籍制度，到周朝时期，已经由萌芽发展为一定的规模，有了一定的制度和管理体制，对后世户籍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具有重大历史影响。

与人口统计并存，作为人口统计的基础，西周建立了一套较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对老百姓的管理组织为：“五家为比，五比为间，四间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⑭ 对农村的管理组织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鄴，五鄴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⑮ 如此严密的户籍管理组织，对于统治者进行人口统计，打下很坚实的基础。

西周的人口管理十分严密。孩子出生三个月，即把姓名和出生年月日登记造册，上报闾师，闾师誊写两份，一份存闾府，一份上报州史，州史再上报州伯，州伯再上报司民。司民是专管掌握和登记统计全国人口数字的，凡男孩八个月，女孩七个月以上的人口，均登记造册。并区别国都、都邑、边远、郊野地区和男女，每年都要登记出生和注销死亡。到了三年，则考校核实，把全国总人口数上报最高司法官即司寇；司寇到阴历十月祀司民之日，向周王奉献此人口数；周王行礼接受，收藏于皇宫，并以此用作赞颂周王治理国家的功绩。西周这种人口管理的办法，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三）春秋战国

春秋初社会比较安定，到了战国时期，则进入了动荡的时代。那时一些较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其它国的支配权，不断进行兼并战争，因此，这个时期战事频繁，征税和征发徭役比较多。因此各国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增加人口，除了当时人口的自然繁殖外，各诸侯国为了补充兵源，富国强兵，不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不得不加强兵源，因而增加人口便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各国统治者对人口调查和统计以及户籍管理都十分重视。最为典型的是商鞅变法，商鞅由卫国投奔秦国，受到秦孝公的重用，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使秦国成为强大的国家。其中重视人口统计，加强户籍管理，严格控制人口，是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讲，商鞅对封建制度最为突出的贡献，就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户籍管理制度。

严格户籍管理，必然要求准确的人口数字，因此，商鞅十分重视人口统计，他规定“四境之

^⑬ 《国语·周语上》。

^⑭ ^⑮ 《周礼·地官》。

内,丈夫女人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⑮在全国范围内经常进行人口调查,将“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⑯列为强国须知的“十三数”中的重要内容,认为“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多,国愈弱至削”。商鞅不仅要求掌握全国人口总数,了解男、女性别的人数,而且要求掌握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口数字。特别是他将掌握年龄组人数和各行业人数看做是“欲强国”的根据之一,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他强调凡新增人口必须登记,死者必须注销户口,则为增减赋税和徭役提供了可靠的根据,在当时如此重视人口调查和统计,是颇有见地的。

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在商鞅主持下,秦国整顿了行政区划。全国划为三十一县,县设令、丞长官。县下设乡,乡设三老、嗇夫、游徼。乡下有里,里设里长,里下设什伍组织,五家为伍,十家为什。推行“连坐法”,在“什伍组织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⑱也就是说,在什伍组织内,要人们相互检举揭发,奖励告密,人民不能自由迁徙,旅店不能留宿没有官府凭证的旅客,违者连坐。以此对老百姓进行严密的管制。

在战国中期出现一部伟大的经济巨著《管子》,这部书的作者,站在新兴地主阶级和独立小私有阶层的利益,发表了许多精辟的人口和经济的观点。《管子》一书是先秦讨论人口问题最多的,而且也是先秦在人口问题上涉猎范围最广的一部著作。最突出的特点是,将人口问题和政治、经济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的。尤其是在有关人口调查和统计方面,《管子》的作者们认识到,要进行封建国家的经济规划,就必须对全国经济活动进行调查和了解。在《管子·问篇》里,一共提出了七十多个问题,其中直接与人口和经济有关的就占去一半还多,是一份缜密的调查提纲。如:

“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问少壮[仕]而未胜甲兵者几何人?问死事之寡,其饥廉何如?问国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问独夫、寡妇、孤穷[寡]、疾病者几何人也?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问乡之良家,其所牧养者几何人矣?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问理园圃而食者几何家?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问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余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几何人?子弟以孝闻于乡里者几何人?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几何人?恶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群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几何人?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国子弟之游于外者几何人?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乡子弟力田为人率者几何人?国子弟之无上事,衣食不节,率子弟不田弋猎者几何人?男女不整齐,乱乡子弟者有乎?问人之贷粟米有别券者几何家?”^⑲

“问篇”反映社会各个方面,其细致周到之程度,为中外古籍所罕见;其调查要求,不仅有对于事物性质的了解,还有对于事物数量的统计。在古代,能对社会人口经济注意得如此周密具体,是值得肯定的。

为了保证调查内容得以实现,《管子》的作者们还建议:“今春曰书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

^⑮ 《商君书·境内》。

^⑯ 《商君书·去强》。

^⑰ ^⑱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⑲ 《管子·问篇》。

稽；与民数得亡。”^①“令曰：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其不为用者辄免之；有痼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并行以定甲士，当被兵之数，上其都。都以临下，视有余不足之处，辄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当被兵之数，与三老、里有司、伍长行里，因父母案行。”^②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到，为使人口调查经常化、制度化，国家春天公布征税率，夏天核实月征收情况，秋天统计征税数额。与此同时，年内人口的增减之数也就统计出来了。所以一年一度的国内人口统计定在秋收之后，即“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③检查户口和土地，弄清人口总数和男女老少的人数。失掉劳动能力的，免征其税；因患有久年不治之病的人，按病人对待；因种种原因不能全力劳动的，按半劳力对待。同时，各地要确定甲士的人数，这个人数要相当于被征当兵的人数，然后上报主管水官。主管水官接到报告后，亲自下去视察，如发现有多余或不足的情况时，就通知下级水官。下级水官为落实确定甲士数，率领三老、里有司、伍长到乡里进行调查，与家长也就是被征者的父母协同查定。作为两千多年前的调查指标，其内容周密而广泛，在世界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人口管理在春秋战国时期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社”的制度在当时诸国已经普遍。本来“社”这个组织，在商、周时便已存在，但到春秋时，鲁、齐、卫、吴、越诸国先后采用了以二十五家为一社的制度。“社之户口，书于版图”。版指户籍，以木版为之。图指地图。当时各国往往以“社”赠让他国，或赏赐臣下。赠、赐的方式，是将人民与土地一起转让给对方。所以“社”的制度也就是户籍制度，是人口管理方面的重要内容。可见战国时，户籍制度又有了新发展。

在战国七雄争霸时期，韩、赵、魏编制户籍较早。那时，这几个国家都推行“上计制度”。即郡、县长官必须于每年年底之前将下一年度的民户和税收的数目作出预算，写在木券之上，送呈国君。国君把木券剖为两份，右券由自己收执，左券发还给地方。俟下年度终了时，国君便操右券考核官吏之任务完成与否，对官吏实行奖罚。秦推行较晚，至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才“为户籍相伍”。商鞅变法以后对人口管理十分严格，男女老少必须进行登记。依据商鞅人口管理的要求，不仅掌握全国人口总数，男女性别的人数，而且对不同年龄组人数和各行各业人数严格查实；强调新增人口必须登记，死者必须注销户口，为秦国增减赋税和徭役提供了可靠的根据。由于秦国重用商鞅实现变法，促使秦国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终于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征服诸国。于公元前221年，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长达五百多年的动乱、分裂局面，统一了全中国，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大国——秦王朝。

二、先秦人口统计与管理的基本思想及其重要意义

我国的人口统计，如果从夏商开始，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所统计的内容逐渐细致周密，这是因为，历代统治者进行人口统计和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征兵、征税、征徭役，尤其役和赋两项是统治者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封建政权进行户口统计之目的，不外课税、徭赋诸事，当然这些举措老百姓是不欢迎的。故以不报户和不报口进行抵制，为此，统治阶级为了加强对百姓的控制，必然严格进行人口调查和统计。

进行人口调查和统计，最终是为了搞好人口管理。我国古代人口管理的基本思想内容，就是根据人口与土地的关系，因地制宜制定国家的人口政策，并以严明的赏罚和周密的社会编

^① 《管子·乘马》。

^② 《管子·度地》。

^③ 《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

制,形成一整套系统的由国家控制的户口编制和管理机构,以保证国家根据政治和经济的需要,加强对人口的统一管理和使用。商鞅就是我国先秦时期比较全面集中的专论人口管理和政策的思想家。他认为,一个国家在人口问题上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不是取决于主观想象,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人口与土地的比例状况。这就要求必须全面地进行人口和土地的调查统计,户籍的管理。借以制定附合国情的人口政策,从而取得一举多得的功效。在某种意义上说,商鞅变法的巨大成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的人口管理思想在实践上的胜利。变法不仅在促使秦国的强大起了决定性作用,也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对后代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考察各国历史人口和土地数字的记录,我国所保留下来的材料之丰富和全面,在世界各国中是首屈一指的。据世界史记载,人口调查最先出现于两个最古老的奴隶制国家——埃及和巴比伦。据梁方仲先生介绍,埃及在早期王国时期,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每年在国内进行一次人口调查。到了新王国时期,也就是公元前十六至十二世纪,又先后进行过人口和牲畜、家畜的清查,同时对奴隶、俘虏人数、庙产的登记以及土地清查及税册编制等。但以公元前四世纪至三世纪托勒密王朝时代的土地登记最为有名。巴比伦最早的人口登记大约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古代历史上关于这两个国家在人口调查的有关制度方面记载较详细,但数字方面是比较缺乏的。从现存的埃及象形文字铭刻和巴比伦的楔形文字铭刻中,亦找不出多少有系统性的全面记载和大量数据。目前流传下来的公元前二世纪时,埃及发雍绿州的土地详细清单,也只不过是某个地区的局部情况。在世界古代史中,保存下来的关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人口调查数字,以公元前十世纪初,以色列国王大卫命军长约押前往查核,以色列诸族民数的记载较为全面,然而登记的只限于20岁以上的能作战的丁男,谈不上全民登记。

从古代世界各国有关人口统计与管理的记载来看,许多都很不细致和全面。而我国自先秦以来,人口统计与管理趋于逐渐完善。尤其到秦汉时期,早已建立起全国规模的人口调查制度。仅《史记》、《汉书》就保留着相当丰富的人口数字。尤以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记载最为全面和详细。它不仅记录了全国的民户和人口数字,而且还有各州、郡的户口数字,同时还有全国东西南北的面积里数以及全国的垦田数。西汉的人口统计数字和全国分区户口数字的完整记录,是世界古代史中所少见的。无数事实说明,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全国规模的人口统计国家,不仅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而且又是最全面最深入细致的,对世界的贡献是很大的。如果没有先秦良好的基础和丰富的人口统计与管理的经验,秦汉决不会制定出如此全面细致的人口统计与管理的制度。

上述事实说明,历代统治阶级常将户口繁庶作为他们的重要政策,对推动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曾起过积极作用。事实上,在地广人稀的古代,在落后的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封建生产关系的社会统治条件下,经济的发展是与人口的多寡成正比,历届封建王朝和割据一方的统治者都了解,人多则粮多、税多、钱多、兵多,这是他们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维护腐朽生活的重要条件。因此,搞好人口统计与管理,奖励生育,则成为他们的重要政策和任务。随着朝代的更替,岁月的流逝,人口统计与管理各项工作则逐渐完善,逐渐科学化。值得说明的是,先秦时期的人口统计与管理,对后代政治、人口与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研究先秦的人口统计与管理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之一。

(作者工作单位:首都经贸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